《世界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 周谷城　田汝康

编委： 庄锡昌（常务）　金重远　庞卓恒　迟　轲
祝　晛　朱威烈　顾晓鸣　顾云深　马小鹤
孙志民　张宪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本书并不打算为印度史专业工作者所用。它旨在为那些对印度有普遍兴趣并且希望使自己熟悉印度古代史的主要进展的人服务。

在本书第一章中，印度历史是从印度雅利安人的文化开始，而不是从印度史前诸文化开始。在"鹈鹕丛书"中，已有了可资利用的印度史前史和史前人类学的研究（Stuart Piggott著"Prehistoric India"），重复同样的材料是无益的。本卷所涉及的次大陆历史，一直到16世纪欧洲人的到来为止。这样就选择1526年为下限。从次大陆范围内历史进化的远景来看，停止在这时限或许是不方便的，因为先前时期的势头继续进入到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但1526年标志着莫卧儿朝代在北印度的开端，而莫卧儿各朝代（与其他各事因一起），是积极卷入了欧洲在印度的将来的。

对不厌其烦阅读书稿和提出中肯之见的那些人，我表示衷心感谢。我尤其要感谢A.L.Basham教授、A.Ghosh先生、S.Mahdi先生和我的父亲。我也要感谢印度考古勘测局提供了地图。

罗米拉·塔帕尔

《世界文化丛书》序

周谷城

今天我们立足于祖国的现代化，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不难看出：现在世界各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正日益趋于紧密，各国家或各地区之间的往来日益方便，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日趋紧密，几乎成了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但要使这些关系发展得很好，甚至合乎我们的理想，则研究、考察、寻找正确方向或理想前途的工夫，为不可少。着眼于文化方面的关系，组织学者、专家研究世界文化，出版世界文化丛书，已成了我们当前的迫切要求。

研究世界文化，先定出题目，请学者进行研究，写成专书，是可能的。学者自己先有研究计划，甚至已有研究成果，拿出来寻找适当的题目，更是可能的。我们组稿工作的进行，大体不外这些方式。每一本书所涉的地区、时间、文化内容都不加限制，是可以的，如"世界文化史"即属此类；估计这类著作不会很多。与此相反，每一本书所涉的地区、时间、文化内容都加以限制，也是可以的，如"欧洲中世纪的教会研究"即属此类；估计这样有限制的著作，一定相当多。介于这两极端之间，有的著作只在地区、时间上有所限制，如"中国先秦文化"或"美国现代文化"即是实例。有的甚至只在地区上有限制，如"印度文化"或"拜占庭文化"即是实例。此外研究文化的方法或理论，如"文化与时间"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等都是实

例。范围这样无定。体例这样不齐，只是由于世界文化从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到今天更是日新月异，不易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不过，不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反而使学者、专家易于着笔或易于发挥各人的独创性。

至于文化发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则不能忽视。发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是不易明确的，这就要诉诸比较研究。即使诉诸比较研究，如果只拿现在与过去比，或拿中国与外国比，充其量只能了解文化的大势；必须进一步有具体细致的比较，才能把方向找出来。分别举例，如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相比，则知手工生产为落后，机器生产是进步的，于是反对落后、追求进步成了我们的方向。又如宗教迷信与科学真理相比，则知宗教迷信为落后，科学真理是进步的，于是反对迷信、追求真理成了我们的方向。又如压迫和剥削，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情；拿压迫剥削与平等互利相比，则知前者为可恨，后者是可贵的，于是反对压迫剥削、追求平等互利成了我们的方向。方向不能忽视，比较研究则大有助于方向的阐明。研究世界文化的学者、专家未必完全没有涉及过比较；把研究的对象完全孤立起来，不顾上下古今，不顾前后左右，是不可能的。今天谈比较，不过希望把比较的范围扩大再扩大，使比较的对象力求具体更具体。果能如是，则研究文化的方向或追求理想的前途决不会落空。余不多谈，即以此为序。

1986年10月6日写于北京

著 者 简 介

罗米拉·塔帕尔（Romila Thapar），女，1931年出生于印度旁遮普邦，毕业于印度旁遮普大学。留学英国，195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得博士学位；以后于伦敦大学任南亚古代史讲师。60年代初起，她担任印度尼赫鲁大学印度古代史教授；著述颇丰，以《阿育王与孔雀王朝之衰落》一书最为著称。1966年，她为英国"企鹅丛书"写成本书，综述远古到16世纪初的印度古代史，特别着重于印度文化诸表现，在宗教、艺术、文学、思想、制度各方面都有精湛论述。

英国"企鹅丛书"另约请英国印度史权威斯皮尔教授（Percival Spear）撰写印度近现代史，此书与本书紧密衔接，构成一部两卷本的自古到今的《印度历史》（A History of India）。本书作为这部印度历史的第1卷，斯皮尔氏书作为第2卷，于1965—1966年印行问世。出版后，立即风行东西各国，倍受好评。现将本书易名为《印度古代文明》，据1976年印行的英文本译出。

塔帕尔曾于1957年、1981年两度到过中国，参观访问了敦煌，并与中国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

译 者

1988年8月于复旦大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世界文化丛书序》 周谷城

前言…… 1

1.祖先…… 1
2.雅利安文化的冲击……16
3.共和诸国和诸王国 约公元前600—前321年……41
4.帝国的出现 公元前321—前185年……63
5.帝国的解体 约公元前200—公元300年……87
6.商业社会的兴起 约公元前200—公元300年…… 106
7.“古典”模式的演变 约公元300—700年…… 135
8.南方诸王国间的冲突 约公元500—900年…… 169
9.蒸蒸日上的南方 约公元900—1300年 …… 199
10.地区性国家在北印度的开端 约公元700—1200年…… 229
11.地区性国家中的封建主义 约公元800—1200年…… 251
12.地区性诸王国的再组合 约公元1200—1526年 …… 278
13.同化在考验中 约公元1200—1526年 …… 303
14.南方趋于一致 约公元1300—1526年 …… 339

历史年表…… 357

参考书目…… 362

索引…… 364

CONTENTS

Preface to the Series of the Cultures of the World
by Zhou Gu-cheng

Introduction 1

1. The Antecedents 1
2. The Impact of Aryan Culture 16
3. Republics and Kingdoms c.600—321B.C. 41
4. The Emergence of Empire 321—185B.C. 63
5. The Disintegration of Empire c.200B.C.—A.D.300 87
6. The Rise of the Mercantile Community c.200B.C.—A.D.300 106
7. The Evotulion of the 'Classical' Pattern c.A.D.300—700 135
8. Conflict in the Southern Kingdoms c.A.D.500—900 169
9. The South in the Ascendant c.A.D.900—1300 ... 199
10. The Beginnings of Regional States in Northern India c.A.D.700—1200 229

11. Feudalism in the Regional States
c. A. D. 800—1200 251
12. The Re-alignment of Regional Kingdoms
c. A. D. 1200—1526 278
13. Assimilation on Trial c. A. D. 1200—1526 303
14. The South Conforms c. A. D. 1300—1526 339

Chronological Table 357

General BiBliography 362

Index 364

1. 祖 先

15

印度的发现——印度历史探讨的变迁——考古学背景

对许多欧洲人来说，印度展现为一幅土邦主、耍蛇人和绳索把戏的画卷。这赋与了印度的事物以诱惑力和浪漫性。但最近几十年来，随着愈来愈多地把印度当作经济不发达国家，印度已经开始从土邦主、耍蛇人和绳索把戏的迷雾中显现出一个形象，一个生气勃勃而充满活力的所在的形象。现在，土邦主们正在迅速消失，而绳索把戏至多只是引起一阵幻觉。唯有耍蛇人还在：通常是一个面黄肌瘦的男子，冒着生命危险抓了一条蛇，拔去它的毒牙，然后训练它随着那葫芦形笛子的节奏而摇摆；所有这一切是寄望于不时得到硬币，以维持他和他的家庭以及那条蛇的生计。

在欧洲人的想象中，印度一直是一个寓言般的国家，有着无穷无尽的财富和神秘莫测的事件，聪明人中有这种想象的比通常人要多。从挖掘黄金的蚂蚁般的众生，到赤身裸体生活在密林中的人，这些就是古代希腊人所了解的印度人的全部模样，并且这种想象固执地持续了许多世纪。不去毁坏这种想象或许是仁慈的，但保存它则会让神话永远存在。

财富在印度，如在其他任何一个古代文化中一样，控制在

少数人手里。各项神秘活动也只在一小撮人中是全神贯注的。然而，接受这些活动却是大众的特性。在某些其他文化中，绳索把戏会被归之于魔鬼的唆使，涉及到这种事的一切，都受抑制；而在印度，这种把戏被当作了娱人的善行。印度文明的根本明智就在于不存在"恶魔之王"。

把财富、魔力和智慧同印度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看法，一直流传了许多个世纪。但是当19世纪欧洲跨入现代时，这种看法
16 开始发生变化，在某些圈子里，对印度文化的缺乏热忱，几乎可以与早期的过分热情相对称。这时才发现印度并没有新的欧洲所钦佩的那些素质。那儿显然没有重视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印度文化是一种停滞的文化，并且是不屑一顾的。麦考莱①蔑视印度的一切的态度，也许是最好的典型。印度的政治制度，主要被看成是土邦主和苏丹们的统治，作为专制暴政和全然无民意可言而不予考虑。这种政治制度在一个民主革命的时代里，是罪恶之至的。

然而，在一小部分欧洲学者中，出现了一种相反的态度；他们主要通过印度的古代哲学和梵文文学来认识印度。这种态度有意识地强调了印度文化的非现代和非实利的方面，在这里，受到赞扬的是持续存在了三千多年的宗教；在这里，相信印度的生活模式密切关联于形而上学和宗教信仰的精密性，以致无暇顾及世俗的生活琐事。德国的浪漫主义对这种形象的印度支持得最为热烈；这种热烈对印度的损害之大，同麦考莱的抛弃印度文化是一样的。对许多欧洲人来说，印度现在成为一个神秘的国家，那儿即使最普通的行为，也加染上了象征主

①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及作家。——译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义。印度是精神化东方的发源地，并且也是那些欧洲知识分子寻求跳出他们自己生活模式的避难地。他们保持着在价值观上的一种二分法，印度的价值观被描绘成是"精神的"，而欧洲的价值观是"物质的"；很少有人想到要把这些假设的精神价值放到印度社会的上下关系中来（这或许导致某些令人颇感困扰的结果）。在过去一百年里，这个主题被一部分印度思想家采纳了；并且成为对印度知识界的一种安慰，因为他们没有力量去和英国的技术优势相竞争。

印度过去的发现，以及18世纪时印度对欧洲的启发，主要是在印度的耶稣会会士和东印度公司雇佣的欧洲人如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查理士·威尔金斯（Charles Wilkins）等人的劳作。不久，有兴趣研究印度古典语言和印度文学的人数增加了，并且到19世纪早期，在语言学、人种史研究以及印度学的其他一些领域里，已见到了可观的成就。欧 17
洲的学者们，对这新的探索领域，表现出一种热烈的兴趣，这见诸致力印度学的人数，而在他们中至少必须提到一位，即马克斯·穆勒（Max Muller）。

在19世纪，与印度关系最直接的那些人是英国的行政官员，早期非印度人的印度历史学家大多在他们中产生。因此，早期的历史是"统治者的历史"，主要涉及王朝和帝王们的兴衰。印度史的主角是那些国王以及对围绕着他们出现的事件的叙述。压迫臣民而漠不关心臣民祸福的专制国王，是印度统治者的标准形象，但阿育王（Ashoka）、旃陀罗·笈多二世（Chandragupta Ⅱ）或阿克巴（Akbar）是例外。至于实际统治，基本的假定是英国的行政管理确实优于次大陆历史上任何其他已知的统治者。

关于印度历史的这种解释，在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对印度史学家们的著作形成了冲击。显著突出统治者生平的王朝史是标准著作的主要内容。但是，这种解释的第二个方面产生了一种不同的反响。大多数的印度史学家，或者投身于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或者受到过运动的影响。他们的论点是：印度的"黄金时期"在英国到来之前就已存在，而印度的远古时期是她历史上特别荣耀的时期。这种观点对于20世纪早期印度人民的民族气概，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不可避免的辅助作用。

在这个关系上，存在着另一件令人嫌恶的事，它在许多有关古代印度的早期著作上，投下了阴影。致力于研究这一时期的欧洲的史学家们是在欧洲的古典传统下成长起来的，这传统坚决相信，古希腊文明——希腊的奇迹，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因而每一个新发现的文化总是用古希腊来衡量，并且一成
18 不变地认为是有所欠缺的。即令那里有些个别特性值得钦佩，而这种习气也试图要把它们与希腊文化相联系。几十年来被看作是印度古代史杰出历史学家的文森特·史密斯(Vincent Smith)，就是倾向于这种趋势的。在叙述位于阿旃陀（Ajanta）的著名佛教徒集居地的壁画时，尤其在述及一幅与希腊艺术和历史完全无关而认为是描绘公元7世纪萨珊波斯国王所派使节到达印度情况的壁画时，他写道：

> ……这幅画除了是印度与波斯间不寻常的政治关系的当代记录之外，作为艺术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它是那些最高价值的作品之一。它不仅确定了在阿旃陀的一些最重要的绘画的年代，由而确立了一个标准，以此为据，其他的年代也能得到判断，并且还可以推想到绘画艺术的阿旃陀

画派有可能源出于波斯，而归根结蒂源于希腊。①

印度的历史学家强烈反对这种说法是无需惊讶的。他们努力要证明，或者印度文化的任何部分不是源出于希腊，或者印度文化就是紧密平行于希腊文化，而展示了希腊文化呈现的全部品质。每一种文明是它自己的奇迹，这概念到那时为止既不为欧洲的，也不为印度的历史学家所承认。以其本身的价值来评定一种文明，这概念是在更晚的阶段才形成的。

18世纪，欧洲的学者第一次与印度建立联系，并对印度的过去产生了好奇，那时，他们的资料来源是婆罗门祭司——公认的古代传统的守护人，婆罗门坚称这种传统是保存在唯有他们才熟识的梵文资料中。这样，印度的早期历史，几乎完全是从保存在古代经典语言的梵文资料上重建起来的。许多这样的著作，在本质上是宗教的，并且这就自然而然地对往事的解释涂上了色彩。甚至一些在某种程度上更为世俗的文学，如“法经”（Dharmashastras，法律书籍），也有婆罗门的作者和注释者；所以“法经”偏向于有利当权者，总是追随婆罗门对过去的解释，而全然不顾历史的真实性。例如，在这些书籍中，种姓制度被描绘成似乎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分层，显然这是早期强加的，并且以后几乎未经触动而保存了许多世纪。然而种姓 19
在印度社会中的实际运用，是容许有很多变化的，“法律书籍”的作者们对此当然不愿承认。

在稍晚时期，使用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这既是对婆罗门资料的某些方面的挑战，又是对其他资料的确证，这样就提供

①V.史密斯（V.Smith），《印度古代史》（Early History of India），1924，442页。——原注

了更精确的历史面貌。从该时代的碑铭及钱币中得到的史料变得日益重要。外国旅行者留下的游记以及非印度的各种资料——希腊、拉丁、中国、阿拉伯等文字——的记载，容许了一些新的看法；还有，通过考古得到了关于过去的更加确实的遗物。例如关于证明佛教的典籍，随着锡兰记载的和来自中国资料的巴利文三藏而有所增加。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有关13世纪以后印度历史的资料，开始按其本身的意义加以研究了，而不再看作是西亚伊斯兰文化的附属品。

早期研究偏重于王朝史也是出于这么一种假设，即在“东方”社会中，统治者的权力即使在日常的行政管理职能中也是至高无上的。然而，在印度的政治体制中，常规职能的权力很少集中在中央。印度社会独一无二的特征——种姓制度——既与政治结成一体，又与专业能动性结成一体，这样的种姓制度使得许多职能都地方化了，而这些职能通常会与真正的“东方专制主义”联结在一起。对于权力在印度的职能作用的理解，在于分析种姓和亚种姓的诸关系，以及在于分析行会与村落会议等诸制度，而不仅仅在于对王朝权力的概观。不幸，这种研究的重大意义只是最近才得到承认，在能够作出有历史根据的概括之前，或许再要花费十年或二十年的潜心研究。至于目前，人们至多只能指出一些可能的权力产生结构。

对各制度的研究并未受到很大重视，部分原因在于相信这些制度没有经过许多变化；这种想法还扶植出一种理论，认为印度文化许多世纪以来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文化，主要是承认印度人的懒散、缺乏朝气以及对生活的宿命观。这当然是一种夸大。即令是对贯穿在千百年来印度人的种姓结构、土地制度或生气蓬勃的商业活动中的变化着的社会关系，作一次粗略分

析，所指向的也决非是一个静态的社会—经济模式。确实，在某个角度上看，印度存在着一种延伸了三千多年的连续不断的文化传统。但是这种连续性不应混同于停滞不前。印度教徒的“迦雅特里”（gayatri）①唱诗有着三千年的历史，但是今天唱颂的内容很难说还是因袭不变的。19世纪人们致力于研究欧洲时，对在欧洲历史上发现的各种演化模式，给予了极大的重视，而同样的方法却从未运用于亚洲史的研究，这是十分令人惊讶的。印度的历史在时间上被看作一系列“孤岛”，各自依据一个特殊的王朝而被命名，同样的格式在大多数印度史学家的标准范本中被袭用了。这并不是说在其他许多方面的研究被忽视了。整个19世纪，在印度社会和宗教的各个方面，许多非常有益的信息搜集到了。但是，不知怎样，这种信息很少被结合使用到历史著作的标准范本中。

对王朝的强调导致了把印度史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古代、中世纪与近代。古代史的上限通常是随着雅利安文化的进来而开始（较后出版的著作中是随着“印度河流域文明”），结束于公元1000年突厥人袭击北印度；这样又开始了中世纪，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中叶英国人的到来。这种分期受到古代史相当于印度教、中世纪相当于穆斯林的不甚恰当的公式的支持，因为第一时期大多数的王朝，究其本源是信奉印度教的，而第二时期的王朝则信奉伊斯兰教。穆斯林时期由于强调穆斯林文化在各方面的隔离性而充满了特色，以区别于更早的时期。在神

① 《梨俱吠陀》中奉献给太阳神“婆维德利”（Savitri）的一种赞美诗，它被看作印度圣典中最神圣的诗。又：“gayatri”韵律是《梨俱吠陀》中最普通的韵律。但在梵文后期已失传了。此韵构成三行八音节的诗，而其末尾有两个长短句，此种形式的诗在《梨俱吠陀》中占有四分之一。——译注

学家和穆斯林统治者的宫廷史官的著作中曾经谋求过对这个说
21 法的辩护理由。总之，不论20世纪印度的政治趋势如何，印度教与穆斯林的分期是为研究印度的印度人史学家和非印度人史学家两者都接受了的。但是印度史的这种分期法，除其本身的假设大可商榷外，它的着重点是导向错误的，宗教决非是印度历史变化的决定性推动因素，宗教仅仅是动力之一，正如其名称所意指的那样。近来，学术界正作出一些努力，根据一种比上述分期法较少专断的演变基础，来重新定出印度历史的主要分期（为了防止混乱，以下各章避免使用分期这个术语）。

还有另一个因素，作为一种观点，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历史解释的重点，那就是次大陆的地理结构。北方辽阔的“印度河—恒河”平原，本身就很容易涌现出大的统一王国。次大陆南半部即半岛地区，被一些山脉、高原、江河流域分割成较小的地区；与北方的平原相比较，变化的地形所容许的政治统一较少。在19世纪与20世纪早期那样的帝国时期中，北部一些较大的王国受到历史学家的青睐。强大的王国繁荣昌盛的时期被看作是“黄金时代”，而那些较小的地区国家显现出来的时期则成了“黑暗时代”。半岛的历史，除了它也可以夸耀为一些帝国的时期之外，极少为人注目。鉴于半岛的政治战略及其经济潜力与北方不一致的事实，半岛的历史进一步遭受冷遇。那些北方的王国把它们的力量主要建立在获得大片领土的基础上，它们的岁入主要来自土地。对任何历史学家来说，这是显而易见和容易理解的模式。那些南方王国的结构，还必需更多考虑到沿海地带对海上权力的作用和海上的经济活动，这就产生了一种比北方王国更为复杂的模式。

阐述有关印度史学著作的演变概况，其目的不是指责早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